

## 西南大学藏龙启瑞手札释读

邹 芙 都

西南大学历史博物馆珍藏有龙启瑞<sup>①</sup>手札一通,内容如下:

受业龙启瑞顿首谨启:夫子大人钧座,敬启者,自去腊已来,叩谒师门<sup>②</sup>,俱值公出,未获少遂瞻依之念。惟我夫子大人勤劳夙夜,宣力王家,弼亮<sup>③</sup>公忠,久为中外所倚重。乃尤复集思广益,思得天下之利弊而讲求之。犹记去冬晋谒时,承赐光霁,殷殷下问。启瑞末学新进,毫无知识,安能效起发于万一。然私念我夫子虚怀大度,采及细微,言之而当,可备选择;使其不当,将必进而教诲之,亦不至有所获罪。故窃有不能已于言者,如台湾达总兵<sup>④</sup>、姚巡道<sup>⑤</sup>之事是也。此二人者,保障边隅,叠著战功。圣天子亦既不次酬庸,恩言屡锡矣!乃近日外议纷纷,金谓有欲动摇之者,事之有无,所不敢知,如其有之,则真失计之甚者也。夫今之为二人议者,曰冒功,曰妄杀,试思逆夷滋扰已来,沿海府厅州县陷城失守者何限,独台湾以孤悬海外之一郡,守固战胜,疆圉晏然,下以夺鲸鲵之气,上不廛宵旰之忧,虽欲不谓之功,不可得也。至谓其斩获之数以少报多,此亦军营将士之常。昔魏尚为云中守,以上首虏功差六级下吏,而冯唐谓为赏太轻,罚太重,虽得颇、牧,弗能用,当疆场多事之际,尤为朝廷惜之。至于妄杀一节,更不足

①龙启瑞(1814-1858),字辑五,号翰臣,广西临桂人。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道光二十三年,出任顺天乡试同考官。道光二十四年,任广东乡试同考官。道光二十七年任湖北学政。咸丰元年(1851),奉命办团练,升为待读学士,咸丰五年回京。次年,升通政司副使,出任江西学政。咸丰七年,改为江西布政使。著有《经籍举要》、《古韵通说》、《尔雅经注集证》、《经德堂文集》等。

②龙启瑞师祁雋藻,位居相国。

③弼亮,辅佐之意。《书·毕命》:“弼亮四世,正色率下。”孔颖达疏:“亮,佐也。”袁宏《后汉纪·灵帝纪下》“师范之功既昭于内,弼亮之勤亦著于外”,司马光《除文彦博制》“弼亮三朝,周旋二纪,再司魁柄,仍冠中枢”,汪懋麟《奉送益都公致政归里》诗“弼亮三公力,凭依九庙灵”。

④达总兵,指台湾镇总兵达洪阿。

⑤姚巡道,指台湾兵备道姚瑩。

为二人罪。盖二人所杀逆夷,皆在和议未成之先,彼时凶逆犯顺,为我朝臣子者,敌王所忤,尚恨不能尽杀乃止,而又何分乎难夷与逆夷哉!且该夷之兵船货船原无分别,岂有滋扰广浙,而独通市于台湾之理。既经开炮轰击,则称难夷。倘事机一失,则彼之乘间而入者,未必不在此称为难夷者也。朝廷既畀以封圻重任,则生杀操纵之权,自当主持,即使所杀过当而于国事有裨,犹将略其迹而论其功,以为激励人心之助,况所杀者皆其扰害中国者也。为权宜之说者,谓不去此二人,则夷不足以和,不知正宜留此二人,而夷之和乃固,试思彼之欲去二人,果属何心?犬羊之性,其欲无厌,予取予求,何所底止!台湾为闽浙根本,窃恐二人一去,则台湾不可复守。台湾不守,则闽浙难保无虞。且庙堂赏罚,贵当乎人心,今以明明有功之臣,而一旦被议,以去草野之民,殊骇听闻,将帅因而解体,士卒因而寒心,则此二人者不足惜,而所以关乎国家之大计者,不可不深思而熟虑计之也。启瑞仅据见闻之所及,未必切中机宜,然细思今日之大局,其转关全在乎此,天下事势,岂容再误。我夫子中朝柱石,士论所归,今日之事谅不可以不言意,朝夕启沃<sup>①</sup>之时,必有所为回天之善术者。故就管见所及,用附于父有诤子之义,惟我夫子采择而垂教焉,则感甚幸甚。临颖不胜悚惶,伏惟鉴察不庄。受业启瑞谨启。

此札记述了道光朝禁烟之后英国索赔开战,台湾戒严并抗击英军等史实,对于我们认识相关问题有重要参考意义。

其一,为研究台湾抗英史提供了新的资料。道光十八年冬,林则徐督两广禁烟后,英人不服,调舰至广东,窥视台湾。台湾虽孤悬海外,名为一郡,实兼内地福、兴、漳、泉四府道里之长,既有鸦片市场,又有淡水供应,英人久欲染指,分别于道光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派运输船“纳尔达”号至鸡隆口、商船“阿纳”号至台湾附近大安港外见机行事。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兵备道姚莹督兵却之,据《福建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奏为英船攻击鸡笼炮台我兵还击获胜折》(军录)、《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奏报生擒英兵并究出奸民通敌情形折》(军录)等奏折<sup>②</sup>,“击沉夷船一只,杉板二只,生擒黑夷一百三十三人,斩馘白红黑夷三十二人,夺获夷炮图册”、“计破夷船,生擒白红黑夷及广东奸民……同夷犯四十九名,粤东奸民五名”等等,大获全胜。《清史稿·姚莹传》对此亦有简略记述:“二十一年秋,英兵两犯鸡(基)隆口,明年正月又犯大安港。莹设方略,与达洪阿督兵连却之,大有斩获。”手札所评“此二人者,保障边隅,叠著战功”、“独

①启沃:谓“竭诚开导”之意,如《梁书·武帝纪下》“朕暗于行事,尤阙治道,孤立在上,如临深谷。凡尔在朝,咸思匡救,献替可否,用相启沃”,梅尧臣《送曾子固苏轼》诗“正如唐虞时,元凯同启沃”。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五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88-202页。

台湾以孤悬海外之一郡,守固战胜,疆圉晏然”正是代表时人对二人及战事的高度评价,为全面了解当时上层人士对抗英斗争的政治态度提供了进一步的资料。

其二,为了解“妄杀冒功”之说的真相及对达洪阿、姚莹及怡良的评价提供了新材料。英人被清军击退后不敢窥视台湾,但闽、浙、粤多被侵扰,清政府与之议和。此后,英领事璞鼎查以“盖达洪阿等既因假诈陷害我人多命……诚恐难保无致干戈复起”威胁清廷,欲除达洪阿、姚莹二人而后快,即手札所言“谓不去此二人,则夷不足以和”;而江苏、福建两地的部分文武官员,忌达、姚之功,予以构陷,致二人被钦差大臣怡良以“诬报邀功”罪押送归京<sup>①</sup>。达、姚二人被勒押京一事成了当时朝廷清议的核心内容,即手札所言“乃近日外议纷纷”。“妄杀”、“冒功”两事之真相,值得作进一步考证。“妄杀”一说即璞鼎查所谓的肆杀遭难商民,“得知我民前在台湾沿海遭风被难者一百数余人,均经该处总兵等官丢开羞脸……非官非兵遇难小民误行妄杀”<sup>②</sup>、“何况此等难人原系水手小民及随营担夫等类无资护……而竟起意凶杀……致我人受枉杀之冤”<sup>③</sup>。事实是否果如璞鼎查所说?据当时审讯记录,“阿纳”号夷目颠林随同璞鼎查到广东,闻“纳尔达”号夷人被全数拿获,璞鼎查命颠林率兵船勾结台湾奸民作内应,前来相机行事<sup>④</sup>。《夷氛闻记》对此亦有记载,可见“阿纳”号商船等并非普通商船,负有特殊使命。而该手札“该夷之兵船货船原无分别,岂有滋扰广浙,而独通市于台湾之理。既经开炮轰击,则称难夷。倘事机一失,则彼之乘间而入者,未必不在此称为难夷者也”等语,更是一目了然、客观地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他国的惯用伎俩。可见,妄杀商民纯粹为无中生有之事,完全是报复之托词。至于“冒功”一说是否属实,该手札也提供了一些新线索。因抚议已成,不值另生枝节,朝廷旨令怡良赴台查办璞鼎查照会事<sup>⑤</sup>。怡良在奉命调查时,结合达、姚二人送给朝廷的奏折发现事实与所奏报内容有所出入,如“纳尔达”号本是遇海潮自行触礁,却奏报成败逃后触礁而沉;“阿纳”号本为渔民自发计诱,却奏报为特意安排所使。另据 Bernard 记“阿纳”号仅载 57 人,而据达洪阿等《生擒英兵并究出奸民通敌情形折》奏报生擒白夷十八人,

① 参见林横:《台湾通史》,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 276 页(上册)、第 601 页(下册)。

② 《璞鼎查照会》(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六册),第 580-581 页。

③ 《英人伪示》(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六册),第 581-582 页。

④ 参看《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奏报生擒英兵并究出奸民通敌情形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五册),第 198-202 页。

⑤ 参见《著钦差大臣伊里布面谕英人如查明前在台湾被俘者确系遭风难英达洪阿必当治罪等事上谕》(上谕档),《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六册),第 735 页。

红夷一人,黑夷三十人,广东汉奸五人。又奏谓溺死者不计其数,又谓杀毙红、黑夷数十人,这远超过了实有歼敌人数。可见,通过原始资料比对,似有诳报邀功之嫌,而由手札“至谓其斩获之数以少报多,此亦军营将士之常”所言似可对该事进一步坐实。可见,冒功之说并非空穴来风。如果真如此,则《清史稿·怡良传》所记“鸡隆、大安之捷,飞章入告,总督怡良心不平”认为怡良等因“忌台湾功”而编造的罪状一说值得斟酌,且怡良深受林则徐影响,对抗英之战极为激进<sup>①</sup>,这牵涉到对怡良的客观评述,在此不作多论。当然,正如手札所言,以少报多,为军士常有之事,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达、姚二人治台功劳及英勇抗英精神的高度评价。

其三,为深化对姚莹的边疆史地思想及实践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鸦片战争前后,姚莹、魏源、林则徐等一批开明人士,为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积极开展边疆史地研究。姚莹开展边疆史地研究的动机正如其自述:“时至今日,海外诸夷侵袭中国甚矣,沿海数省既遭蹂躏,大将数出,失地丧师,卒以千万取和。至今海疆大吏受其侮辱而不敢较。”<sup>②</sup>其出发点是为反对海外诸夷的侵袭,而要达到强疆的目的,莫过于对边疆及外域作深入了解。姚莹在边疆史地研究方面著述甚丰并将边疆史地思想尤其是海疆思想运用于实践,如在就任台湾兵备道期间,重视海域与海事,加强台湾防务建设;严守口岸,实行普遍防守与重点防守相结合;注重组织、利用民众力量抗英保台,等等。该手札所述内容则与姚莹抗英保台密切相关,对研究姚莹的海疆思想及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者工作单位: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sup>①</sup>可参见《兼署总督怡良在广州悬赏缉拿英国船与英国人的告示》,(美)裨治文主编:《中国文库》第十卷第三期,1841年3月。

<sup>②</sup>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八,同治六年(1867)桐城姚氏刻本。